作为一门课程的中国文学史，既是对欧美和日本学制的模仿，也是塑造中国民族形象、构造民族精神的重要工具。在课程成立之后，中国文学史变得越来越重要。它既提供了常识，又培养了学生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随着教育的行政化、制度化，中国文学史课程的地位也变得难以挑战。教材的编写则是依照主流意识形态而动。

具体到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层面，以1950年为分界线，之前是个人主义的自由教学，之后则是集中备课、集体编写教材，以教育部高等学校教材编审委员会领导编写的统一教学大纲进行教学。1950年的《大纲》以课时控制叙述节奏，对于教材的结构亦分为清楚明晰的导论、总结等。中国文学史的教材基本上也因循着集体话语。

“中国文学史”一旦与自己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及教学方式相吻合，知识、思想的权力加上教育的权力，即使它在获得绝对合理性、绝对权威性的那一刻，就自然产生出强烈的唯一性、排他性。（108）

中国文学的全部内容和阅读的丰富性也被牺牲了。